



觸摸歷史與進入西

陈平原 著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陈平原 著

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/陈平原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8.10
(陈平原著作系列)

ISBN 978-7-301-29782-7

I. ①触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五四运动-研究 IV. ①K261.1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9418 号

- 书 名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
CHUMO LISHI YU JINRU WUSI
-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著
- 责任编辑 张文礼 张凤珠
- 标准书号 ISBN 978-7-301-29782-7
-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
-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- 网 址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- 电子信箱 pkuwsz@126.com
-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
-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-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
- 650 毫米 × 980 毫米 16 开本 28.25 印张 377 千字
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- 定 价 98.00 元 (精装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目 次

导言 文本中见历史 细节处显精神001

第一章 五月四日那一天

——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010

一 关于五四运动010

二 五月四日那一天015

三 如何进入历史?045

四 回到五四现场048

第二章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

——《新青年》研究059

一 同人杂志“精神之团结”061

二 “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”071

三 以“运动”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079

四 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093

五 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109

六 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124

第三章 叩问大学的意义

- 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140
- 一 “兼容并包”的办学理念140
- 二 北大传统的另一种阐释152
- 三 老北大的艺术教育162

第四章 学问该如何表述

- 以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为中心187
- 一 古文的骄傲与白话的先驱190
- 二 令人神往的“提奖光复，未尝废学”203
- 三 深思独得与有感而发218
- 四 白话文的另一渊源233

第五章 经典是怎样形成的

- 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245
- 一 删诗事件247
- 二 老朋友的意见253
- 三 学生的建议259
- 四 二周的眼光269
- 五 胡适的自我调整283
- 六 经典地位的确立297

第六章 写在“新文化”边上

- 旧纸堆里的新发现314
- 一 失落在异邦的“国故”314
- 二 在巴黎邂逅“老北大”332
- 三 不该被遗忘的“文学史”345
- 四 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360

附录一 关于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375

附录二 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地发现386

附录三 台湾版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自序393

附录四 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英译本序397

引用及参考书目399

索 引412

后 记444

导言 文本中见历史 细节处显精神

在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者看来，作为课题的“五四新文化”，早已是明日黄花，不值得格外关注。原因呢，据说是研究著作汗牛充栋，该说的都说了，很难再有新的发现；经过八十多年的争夺，论题及证据多被意识形态“污染”；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该轮到长期被压抑的晚清引领风骚了。可我还是认定，这一曾经十分时尚、如今略显落寞的题目，仍然蕴含着无限生机。

正如美国学者舒衡哲所说的，“五四的回忆史”之所以值得我们认真面对，就因为这些五花八门的“陈述”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历史”，更多的是表达某种政见和立场。“在中国大陆和台湾，纪念和回忆一直错综复杂地联系着。个人的回忆从未摆脱社会历史的需要，1949年之后更是如此。”^[1]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另外，由于五四运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与合理性，经由一次次纪念仪式的召唤，当事人的“回忆”日渐清晰，而且“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”^[2]。所有这些，

[1] 薇拉·施瓦支(Vera Schwarcz)著、李国英等译：《中国的启蒙运动——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》308页，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。

[2] 钱锺书《写在人生边上·重印本序》称：“我们在创作中，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，而一到回忆时，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、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，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。”《写在人生边上》5页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0年。

都对阅读、理解、诠释作为思想潮流 / 文学革命 / 政治运动的五四，构成了某种巨大的障碍。即便如此，无论是一场纷纭复杂的政治运动，还是一本版本确凿的著述，诠释活动潜在的无限性，并不意味着其无所归依，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随意蔓延^[1]。毫无疑问，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，诠释者对事件以及文本的解读，总是不尽如人意。但同是诠释，有高低雅俗之分。更重要的是，学者们的诠释活动，反过来会影响当事人对于事件（比如五四）的追忆。

并非抹杀官方与民间在“五四记忆”上的巨大差异，也不回避左派与右派都喜欢拿五四做文章，我只是强调，每个研究“现代中国”的学者，都可能参与到建构五四传统的行列中。不管你是主张继承，还是希望反叛，直面五四，是我们的共同命运。十二年前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“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”上，我做了题为《走出“五四”》的专题发言，其中提到：

“五四”除了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，很大程度成了20世纪中国人更新传统、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象征。每代人在纪念“五四”、诠释“五四”时，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自己时代的课题和答案。但另一方面，以“五四”命名的新文化运动，又有其相对确定的历史内涵。其文化口号、其学术思路，萌芽于晚清，延续至今日——可以这么说，在思想文化领域，我们今天仍生活在

[1] 我同意符号学家兼小说家艾柯的意见：“说诠释（‘衍义’的基本特征）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，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‘蔓延’。”“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，作品‘本文’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，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，而是有所归依。”参见艾柯等著、王宇根译《诠释与过度诠释》28、108页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7年。

“五四”的余荫里。^[1]

时至今日，我仍坚持这一看法：所谓“超越五四”，首先是深入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历史语境、政治立场、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思路。

人类历史上，有过许多“关键时刻”，其巨大的辐射力量，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你都必须认真面对，这样，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，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。在我看来，“‘事件’早已死去，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，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”^[2]。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，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。作为后来者，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（包括思想学说、文化潮流、政治运作等）这样的关键时刻、关键人物、关键学说，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。这是一种必要的“思维操练”，也是走向“心灵成熟”的必由之路。

与五四对话，可以是追怀与摹写，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；唯一不能允许的，是漠视或刻意回避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五四之于我辈，既是历史，也是现实；既是学术，更是精神。

必须说明的是，本书之谈论五四，有个明显的特点，那就是兼及晚清（如探究《新青年》的编辑方针、章太炎的白话文、傅斯年之批注《国故论衡》、梁启超的谈论中学国文教学等）。这不仅仅是具体的论述策略，更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。谈论五四时，格外关注“‘五四’中的‘晚清’”；反过来，研究晚清时，则努力开掘“‘晚清’

[1] 参阅拙文《走出“五四”》，见拙著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69—75页，珠海：珠海出版社，1995年。文中，我将五四建立起来的学术范式简要概括为：“西化的思想背景；专才的教育体制；泛政治的学术追求；‘进化’、‘疑古’、‘平民’为代表的研究思路。”

[2] 参见拙文《无法回避的“1968”》，《万象》创刊号，1998年11月；拙著《茱萸集》113—124页，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1年。

中的“五四”。因为，在我看来，正是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，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。

在1988年出版的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一书的“导言”中，我专门谈道：

毫无疑问，五四作家和被他们称为“老新党”的“新小说”家有很大的差别——从思想意识到具体的艺术感受方式。但我仍然把梁启超、吴趼人、林纾为代表的“新小说”家和鲁迅、郁达夫、叶圣陶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一起论述，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。^[1]

十年后，我撰述并出版了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》，在“导论”中再次强调：

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，这点比较容易被接受。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，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“共谋”，开创了现代学术的新天地。……

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，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，这种论述策略，除了强调两代人的“共谋”外，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。相对来说，上限好定，下限则见仁见智。在我看来，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，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，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。另一方面，随着舆论一律、党化教育的推行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

[1] 参见拙著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30—31页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。

哗、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^[1]

正因为兼及五四与晚清，这种学术视野，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——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；最近十年，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，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，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。

活跃于 1880—1930 年代这半个世纪的文人学者，大致上可分为“戊戌的一代”和“五四的一代”，前者如黄遵宪、林纾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，后者则有蔡元培、陈独秀、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等。这确实是两代人，可思想学说以及文学趣味上有大量重叠或互相衔接的成分。正是这两代人，共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再三评说的“新文化”。因此，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，既不独尊五四，也不偏爱晚清。

随着话题的转移，有时晚清，有时五四，这很好理解；考虑到新文化的多面向，在不同学科之间来回穿梭，有时文学、政治，有时艺术、教育，这也不难说明。需要略加解释的是，何以如此重要的话题，最后竟落实在若干个案的辨析上——谈论五四新文化，入手处竟然是一场运动、一份杂志、一位校长、一册文章以及一本诗集等。这样的论述策略，能否承担引领读者“进入五四”的重任？

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众说纷纭的话题，确实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作为研究者，你可以往高处看，往大处看，

[1] 参见拙著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》6—8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。

也可以往细处看，往深处看。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——于文本中见历史，于细节处显精神。

所谓“触摸历史”，不外是借助细节，重建现场；借助文本，钩沉思想；借助个案，呈现进程。讨论的对象，包括有形的游行、杂志、大学、诗文集，也包括无形的思想、文体、经典、文学场。入口处小，开掘必须深，否则意义不大；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，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。我曾经引胡适和王国维关于学问的两段话，辨析学术研究中的“大”与“小”。一说“学问是平等的”，一说“考据颇确，特事小耳”，抽离具体的历史语境，呈现出某种张力。单就学术训练而言，只要干脆利落地解决某一课题，便该得满分；可治学毕竟不同于做习题，应该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。这个时候，所谓的“事大”“事小”，便可能影响价值评判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大与小，并非指事物本身的体积，而在于其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有无深入发掘与阐释的可能，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。^[1]

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，仔细推敲，步步为营，这一研究思路，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示。选择“药·酒·女·佛”来谈论汉魏六朝文章，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，可鲁迅成功了。“舍弃了面面俱到的评说，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‘小题大做’，不只需要学力深厚，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。”^[2]我之谈论五四新文化，选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、《新青年》中的文体对话、蔡元培的大学理念、章太炎的白话试验、北大的文学史教学，还有新诗的经典化过程等，

[1] 参见《现代中国》第二辑（武汉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3月）的《编后》。所引胡适文字见《〈水浒传〉后考》，王国维文字见姚名达《哀余断忆》。

[2] 参阅《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》，见拙著《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》14—55页，南宁：广西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。

不见得十分到位，但都有自家面目。

记得本书第一章单独发表时，便有台湾朋友询问：是否借鉴了年鉴学派或新历史主义。我的回答很坦然：确实读过一点斯蒂芬·葛林布雷 (S. Greenblatt)、海登·怀特 (Hayden White) 以及布罗代尔 (F. Braudel)、勒高夫 (J. le Goff) 等人的著作，但不敢胡乱攀附。我之所以如此述学，主要受三位中国学者的启示。

本书第六章的题目，明眼人一看都知道，这是在追摹钱锺书的随笔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。并非追求“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”，而是意识到五四新文化“这本书真大！一时不易看完”，与其像钱先生所嘲笑的那些“负有指导读者、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”的书评家那样，“无须看得几页书，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”，还不如“不慌不忙地浏览”，“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”，留下若干属于自己的真切感受。^[1]这种拒斥过分的体系化、注重真切感受的论述策略，在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编》等名著中清晰可见。

其实，我之倾向于在“边”上做文章，还有另外一个来源，那就是金克木的抓“边”。在《说“边”》一文，金先生开宗明义：“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，不大讲边，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。没有边，何来中心？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。”有空间的边，那就是边疆；有时间的边，那就是新旧交替；还有“现象和意义之间的边，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边，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边”——所有这些“边”，都值得认真琢磨。^[2]

[1] 参见钱锺书《写在人生边上·序》，《写在人生边上》1—2页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0年。

[2] 参见拙文《“〈读书〉时代”的精灵——怀念金克木先生》，《读书》2000年12期；《茱萸集》78页，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1年。

至于在史学研究中，强调对于古人的同情与体贴，警惕“过度阐释”，则有陈寅恪的影响在内。陈先生在谈论哲学史写作时，说过这么一段话：

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，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，欲借此残余断片，以窥测其全部结构，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谓真了解者，必神游冥想，与立说之古人，处于同一境界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，表一种之同情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，而无隔阂肤廓之论。^[1]

了解今人进入历史的困难，以及所谓历史重建的复杂性，不敢放言空论。或许，对于史学家来说，次序井然、因果明确、排列整齐、体系严密，不见得都是好事情。

至于像本书这样，借助若干自以为意味深长的细节、断片、个案，来钩稽并重建历史，固然可以避免“宏大叙事”的某些缺陷，但也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，那就是将一场生气淋漓的文化运动，拆解成“一地鸡毛”。这是我所最为警惕的。换句话说，有趣的人物及故事背后，依然有作者潜藏着的理论意识：包括重建现场时多声部与主旋律的关系、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如何既合力又竞争、新文化运动中垄断舆论与提倡学术的张力、现代中国大学理想的生成与展开、媒介的作用与文体的意义等。

今人所接触到的，永远只能是“文明的碎片”；在这个意义上，

[1] 陈寅恪：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247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。

谈论历史而倚重省略号，其实是相当明智的。区区六章，只是勾勒了五四新文化的某一侧面。若能给读者些许真切的感受，帮助其“进入五四”，则于愿足矣。

2005年6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第一章 五月四日那一天

——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

一 关于五四运动

在 20 世纪中国，五四运动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，老百姓耳熟能详，学界更是了如指掌。作为一门新崛起的显学（相对于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），关于五四的研究著作，确实称得上“车载斗量”。八十年来，当事人、反对者、先驱、后学，无不激扬文字，留下各自心目中的五四。仔细分梳这些色彩斑斓而又互相抵牾的图景，那是专家学者的工作；至于一般读者，只需要对这场影响极为深远、不断被后人挂在嘴边的群众运动，有个大致的了解。

于是，我选择了权威的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，希望能得到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。因为，与“成一家之言”的专家著述不同，辞书讲究准确、简要、平实。谁都知道，若想尽快进入某一特定语境，没有比借助辞书更合适的了。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纷纭复杂的五四，固然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打发；可“百科全书”出现如此多的错漏，毕竟出人意料。看来，“耳熟能详”“了如指掌”云云，需要打点折扣。

以下抄录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中“五四运动”这一词条，然后

略做补充、辨析。文中*号为笔者所加，目的是提供对照阅读的线索。

五四运动（May Fourth Movement） 1919年5月4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，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。一般认为，这次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*。1919年1月，各协约国谈判对德和约，消息传到中国，中国人得悉和会决定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，同时日本政府对以军阀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，提出二十一条要求，企图独自支配全中国*。当北洋政府即将签订和约并答应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传开时，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罢课*，提出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、“取消二十一条”、“拒绝和约签字”等口号，同时举行游行示威。政府军警对运动实行镇压，逮捕学生32人，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，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，举行示威游行，召开宣传大会，并实行抵制日货。6月3—4日，北洋政府进行了大规模逮捕，仅北京一地，即有千名学生被捕。运动声势波及各大城市，上海、南京、天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举行罢工，上海各家商店举行罢市，以声援学生和工人，全国文化界也表达了对这次群众性斗争的同情，斗争随即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。北洋政府最后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，将三名亲日的内阁总长撤职*，并答应将不签订和约及二十一条要求*。

五四运动前夕，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毛泽东开始创办刊物、发表文章，提倡民主和科学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，推动新文化*。温和派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，反对马克思主义，却强烈支持文学改革，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；提倡婚姻自由，反对父母包办；主张取缔娼妓；